

文化是经济的支撑力,因为人的因素第一,一切奇迹都要人去创造;而人的素质又是文化铸就的。中国创造了30多年的经济腾飞的世界奇迹,为我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愈来愈多的国家感知到中国的文化支撑力,于是一个倾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热潮,促进世界文明的文化对话出现了。现在全球已经建立了近350个“孔子学院”,并兴起了学习汉语热。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日益彰显与播扬。

文化定义颇为歧异,但综合要义,其共识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内涵十分博大,起码民俗习尚、婚礼纪庆、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典章制度、器物用品等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无不渗透着文化或者说为文化所主宰;二是文化的长期积淀形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共性,即主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是文化的最终价值是归于精神与人格的。

做到文化自觉一定要对以上三个层面的文化内涵有理性的审视与评价,即是说,没有辩证的思想方法,审视与评价肯定走向片面。

我国传统文化内涵组成的主要元素是儒、释、道三家文化,其中又以儒家思想影响最大。它的仁、和、忠、恕、礼、义、廉、耻、温、恭、俭、让、智、勇、信、中……至今仍有其合理的元素,仍涵盖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规范。它外在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在强调“正心”、“诚意”、“修身”,做“君子”,从而达到“大同世界”、“和谐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我们政治理想的参照系。能像儒家思想这样具有深厚、严整、周全和规范标准的文化底蕴以及文化表征的,世界独一无二。这是世界“孔子热”的根本缘由。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而忽略传统文化的组成是多元性的,绝非儒学一家。是封建统治者别有用心地“独尊儒术”,打压其它各家思想,才将儒家思想视为传统文化惟一的主流文化的。另外一些重要元素,比如,佛教通过修身做“觉者”的人文理想,特别是道家思想文化,过去我们曾以其“出世”的表象,判断其消极而批判之,其实是不解其意的。如果今天我们不能被曲解的道家思想正名,我们仍达不到文化自觉。首先,老子说的“无为”并非让人们什么也不做,而是为了“无不为”,这是人生“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的辩证法,如此“大智慧”却遭到我们的批判与摒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那句壮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恰恰出自庄子讲的故事中,只能在树林间跳跃的燕雀,自己胸无大志,却讥笑“扶摇直上九万里”,胸怀大志的大鹏鸟。所以道家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思想同样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可贵的基本元素,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所需要的。第二,道家思想最本质的是“道法自然”,一切事物皆有其自然的内在规律,人应当顺应自然,按照规律办事。这是道家思想文化的最高境界。它告诉我们一种和谐的人生哲学、境界、态度;不为名利所迷而汲汲之,不为荣华所惑而营营

若无辩证思维 岂能文化自觉

□孙武臣

之;它要人们清静无为、乐天从命、无沾无挂、与世无争。能达到这种“至人”境界的,能有几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目的的精神价值,能使人们活得更真实、更自在、更友爱、更善良、更和谐。

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远大于道家思想,甚至出现“独尊儒术”的长期历史阶段;然而,谁能想到在西方,道家思想影响却早于并大于儒家思想。西方出版老子著作很普遍,出版数量之大仅次于他们的《圣经》。但道家思想在我国始终成不了主流。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开始逐渐深入研究,这才感悟到:哟,学问大啦!作家王蒙还出版了感悟老庄的专著,并在大讲堂谈个人体会,大受欢迎。尽管在研究中还有歧义,但我相信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接近老子主张的人生哲学与人生态度,并能结束儒道对立不能相融的历史,醒悟到它们互补的辩证关系,就能获得历史的辩证的文化自觉性,就能在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和谐的精神文明中获得内驱力。

毫无疑问,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核心内涵对我们今天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无论怎样的应时而变,这一文化的灵魂,不但不能变,而且还要不断地光大发扬。

二

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涵积淀下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铸就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集体人格。没有这个道德精神的主流,经历了世界上最漫长最大苦难的中华民族不可能生生不息几千年,非但没有消亡,而且至今又进入了一个史以来的最佳时期,为着民族的再度复兴辉煌而奋斗不已。它见证了我们传承主流文化中强大的道德精神支柱正是我们事业大厦稳固的根基。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着相当强大的保守性,因而它相对稳定相对凝固,也相对完整,再加上它还有一定的排他性,所以即使在强势的外来文化的“入侵”下,民族文化的变化也只是渐变,较为缓慢。这是文化特征决定的,也是我们必须具有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面临当今众多的新危机和挑战,我们必须严肃地反思我们的文化中有没有消极的局限性和负面性,不然,就会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困惑中。同样我们也要从文化积淀的角度与层面去解析。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一百多年的殖民文化怎么可能不带给人负面影响呢?比如,儒家思想毕竟是特定历史与社会的产物,不可能不打上当时社会矛盾的烙印。它的诸多等级森严的观念与戒律,恰恰可以为统治者所利用,用来影响、规范、束缚、桎梏人民大众的思想行为,从而

而积淀下惰性的心理定势。殖民文化更是以“奴性”为核心。这两种文化长期的先后共同作用,其恶果是大刀削弱和泯灭了人们的进取与变革的思想意识,大大有利于专制的封建统治者和殖民主义统治者,使其延缓灭亡。难怪历代封建统治者建朝之初都要去“朝圣尊孔”。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伟大意义;就不能理解“五四”运动为什么呐喊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就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用了大半生精力投入到反封建的战斗中,他要呐喊,要唤醒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起来砸碎它,冲出来。当时如果不放大地突出封建文化的局限性和负面性,引起国人觉醒,革命就连萌芽阶段都进入不到了。

我们要辩证地从历史进程中得到启示。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包括“国学”这个词的内涵与外延是否准确),不能“精华”与“糟粕”不加历史地辩证地辨识,我们的“尊孔”是尊儒思想的精华,只有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立国力量,提升国民精神文明水平,从而构建和谐社会。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只能作为实现我们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建设的参照系,而不是像有的“国学”专家所说的,似乎儒家思想就是思想文化的最高范畴,似乎就可以取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与发展、开放与多元、坚守与包容、积淀与创新的内涵与理念,这就大错了。“尊孔”尊到“至圣”的地步,就又走到了极致。儒家学说绝不是解决当今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灵丹妙药”,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守护我们的“根”,绝不能动摇,但也绝不能止于此。我们不能只局限于历史的文化传统,一定还要赋予中国文化以新的理念与新的内容,即强烈的创新的当代性;因为“今昔两重天”,昔日的“草民”变“国民”,“奴隶”变成“主人”,并且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从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竞争的胜利。这是考量并保持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时必须的“出发点”。我们绝不能因袭封建统治者的“尊孔”,将其“工具化”,使其成为“敲门砖”,利用其诸如“三纲五常”之类伦理道德的糟粕,达到麻痹人民的自觉意识,使他们安于现状,满足于愚昧落后的奴隶地位,从而巩固其封建专制。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我们必须具有的清醒。

三

文化制约人类,即是说文化积淀了人的心灵结构中的优质和劣质,国人亦然。因此,我们不能回避长期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在我们国人心里积淀下的一些落后、保守、愚昧、自私等负面劣质。我们要理性地认识到鲁迅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历史任务,仍是我们当今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不然,我们如何从“根”上解析眼前方方面面的道德滑坡的种种乱象呢?何况以伦理、道德、礼俗、制度等为主要因素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以世界性科学技术为主要因素的物质文明建设不可能同步。物质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已经飞速地跨越了几个时代,而精神文明依然“进三步退两步”般地缓慢地前行。后者较前者要艰难得多。

同样以文化的保守性稳定性来解析“国民劣根性”,它也不是一两个历史时期所能革除的。所以,道德滑坡具有其必然性和阶段性。但这不等于说可以丝毫弱化与放弃“改造”的任务。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放弃文化立国的国策,文化强国的绿洲亦可能一步步变成文化沙漠;这样的历史悲剧在世界上不是没有演出过。

文化虽然具有保守性,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文化也显现出它的渐变性,甚至是速变性。比如,改革开放后短短的30多年里,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吗?近些年来,国人除了春节之外,其它传统节日诸如清明、端午等节日都有所淡化;而对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却愈发热情,就是世界文化流变性的典型之例。

道德文化亦如此。实施市场经济以来,金钱的两面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凸显过。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惊叹财富的力量,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如此拥有过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金钱刺激与膨胀了“国民劣根性”,从而滋生并陡增出许多异化现象,诸如,金钱本为入役使,异化成了人是金钱的奴隶;干部本为人民的公仆,不少却异化成了人民的主人……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悖论:物质财富丰厚了,却找不到精神家园了,即钱袋子鼓了,却又“穷”得只剩下了钱;拥有了票子、房子、车子,而信誉感、安全感、幸福感却下降了……总之,多了“经济人”,少了“精神人”;多了“铜臭味”,少了“人文味”。

这些社会乱象是人制造的,而这些人也正是落后文化影响与作用的结果。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的对立统一,正是当今社会道德精神的整体面貌,缺憾和夸大了哪个方面都可能接近事物的本质真实。

毋庸置疑,我们的社会媒体一定要真实报道,一定要担负起批判假丑恶的社会责任;但值得反思的是在经济利益驱动的竞争中却一度偏于负面新闻报道,有意集中与夸张假丑恶的人和事,热衷炒作,以制造耸人听闻、夺人眼球的效果。其片面性势必影响了大众理性辩证的思维方法,走向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辨析不清美与丑,孰是主流,以致对社会悲观失望,缺乏信心。

“不是没有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自倡导“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后,媒体即刻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与温暖。只要留意一下各种传媒,我们会看到许多传播真善美的专题栏目。如果将它们搜集在一起,等于作了各行各业不同群体“2011最美人物”的盘点。那是永无休止的“平凡而非凡”的长镜头!采访者和阅读者都再一次感悟到:伟大在哪里?在平凡中!平凡孕育着伟大,“好人就在你身边”,“好人就是你我他”!

2011年有两个两岁的小女孩的命运引发了一场社会道德大讨论,也传达出空前的一次人们对道德的“追问”。如果那位拾荒的老奶奶是路过的第一人,或许我们仍能看到悦然的笑容;冷酷的是7分钟内路过了18个人竟无一人伸手救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毕竟还有最美的人,如果没有“最美妈妈”不顾自己安危的双臂一接,妞妞的命运岂不和悦然一样成为悲剧?大爱让妞妞的笑容更加灿烂。悦然和妞妞给我们留下了人人都要回答的思考题——美丑即人生。文化使然,不仅中国,世界亦如此。思想精神层面的物质化、世俗化,人文心灵的萎缩是全球性的现象。因此,那种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地评价国人都是片面的。

历史证明:几乎一切失误都是偏离与失去了辩证思维所导致的。

面对假丑恶的现实乱象,我们需要理性的清醒,勿要极端地以为它就是我们当今道德精神的主流。尽管真善美在常态中并不大凸显,但国人在国家大事、难事面前总能凸现道德精神的主流,并且每每感动世界。即使如此,我们同样也要理性清醒地认识到道德精神正遭到腐蚀的严重性,如任其蔓延和发展下去,任道德无止境地滑坡,其破坏力最终会终结我们事业的持续发展。

于是,我们有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宏图,要将这宏图变为现实,我们必须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凝聚人文精神,提升文化修养,培养向真向善向美的力量。否则,宏图依然是宏图。央视《感动中国》为我们积淀下十年的感动,许多地方台也相继举办了表彰道德模范的颁奖大会。问题是我们要利用好这些“德育教材”,让它们成为道德引领的灯塔,照亮我们的心灵,成为弘扬真善美的契机和载体。新闻人在发现与传播美的同时,也升华了自己的心灵美。

文化是文学的根与魂,在这一合力中,文学理应担当文化立国的重任,文学的力量也能成为文化立国的骨干推手;因为文学美能“润物细无声”地养心生爱。大爱精神,究其根本是来自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力量,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真善美的道德主流就会愈来愈波澜壮阔,历史阶段性的假丑恶就会愈来愈溃退与缩小。

文化是文学之母,因而也是作家创作主体之母,它决定着创作者的价值与审美的取向,所以作家首先要达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首先具有辩证思维的能力,舍此,不能走向深刻。

理论观察

务必向原创倾斜

朱辉军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要大幅度地提升我国的原创力。

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早在2005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一些科学家就提出:“着力提升科技原创力”;历史学家许倬云2011年6月也针对我国的教育状况提出:“寻求有原创力的教育”;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2011年3月也不约而同地提到:“医学人才要重原创力”。……可见,原创是时代的呼唤,是知识界的共识。

文艺是最需要原创的,也是人类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和施展的重要领域。可当今中国文艺界的状况到底如何呢?

在不久前举行的“2011中国版权年会”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表示:目前国内很多文化艺术作品创造力不够,90%的作品是属于模仿和复制的。电影、电视、小说等领域,作品重复和复制的最多。这应当是相当权威的评估了,尽管那比率不一定准确,但原创性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柳斌杰也表示:今后国家将通过设立文化创意扶持体制和基金,来提高文艺作品的创新能力。

既然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峻,那就从现在做起吧。当代中国文艺的原创性不足,是中国文艺家不够聪明吗?是他们不够勤奋吗?还是另有原因?

当代中国文艺家固然也难辞其咎,比如心浮气躁,比如生活积累不足,比如想象力贫乏,比如思想高度不够,等等。但我以为,文化环境和氛围也是一个重要缘由。有舆论认为:国内的版权保护意识和保护力度严重滞后,客观上也压制了创新,怂恿了克隆、复制和抄袭。搞原创的竞争不过搞盗版的,结果就使原创的也去盗版了。这的确是令我们痛心疾首的现实。同时,社会各界普遍对原创性的重视和关注不够,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原创应当是文艺活动链的源头,应当是“原创——演绎、改编——评论、评论——管理”这样一条有序的活动链。而目前,原创是最得不到重视的,演出啊,评奖啊等,反而受到高度的关注。影视界关于“编剧署名”的问题已经呼吁过多少遍了,可迄今依然得不到根本改观;音乐界的版权保护诚然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侵犯原创著作权的现象也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不能不让那些坚持原创的文艺家心寒却步。

文艺原创力的提升,务必要放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占据制高点的高度上来认识。原创性的程度,实质上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体现,是国际综合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砝码。原创性的作品,不仅深刻地改变着当今人们的心灵和感觉,而且往往能影响一代又一代后人,并能给其他民族和国家今天和往后的人们以滋养和启迪。

不愧于“文化强国”的国家,是将原创放在首位的。这使我想到斯大林在纳粹大兵压境之际在红场上的那段著名演

讲。他当时怒斥纳粹德国侵略者道:“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立柯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在兵临城下之际,斯大林以俄罗斯的民族英烈们的英名来激励苏联将士和人民。这里有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评论家等等,他们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等革命家、科学家、军事家等相提并论,可见在斯大林以及能够为斯大林的激励所打动的苏联将士和人民心中的地位之崇高!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战争年代,已经属于历史。不是这样的。你们看今日欧洲各国,他们对待他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常常也是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对他们的作品,对他们的遗物以及故居等,都格外地尊重。我们这里呢?一个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不经任何部门批准,甚至都不通告一声,说拆就给拆了!利益的驱动远远压倒了精神的寄托!更遑论尊重原创了!

所以,务必要形成一种氛围,一种舆论,高度重视文艺的原创性。要从政策上、荣誉上、奖项上,当然还有资助上,向原创作品倾斜,向具有原创力的文艺家倾斜,向支持和开发原创性的组织和团体倾斜。惟有如此,我国文艺的原创性程度才有可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从而在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

科技界特别注重转载率、引用率。我看,在文艺界,也可以考虑讲求传播量和改编量。真正原创的作品,是富有生命力的,是不受时代地域限制的,因此也常常成为传播量最广、改编量最高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一部《安娜·卡列尼娜》就曾被改编过18次之多,而且许多是俄苏之外的国家改编的;鲁迅作品的传播量,不仅是在他世时已传播至日本、苏联、东欧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他去世之后多年,更远播至非洲和美洲!因而,我觉得,对当代作家艺术家,可以其传播量和改编量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估指标。

因为斯大林提到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又让我想到,文艺理论以及见地独到的文艺评论,也应视为“原创性”作品。别、车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理论和评论,其原创程度丝毫不亚于高尔基和契诃夫。同样,康德、席勒、黑格尔的美学著作,其原创力也堪与歌德、托马斯曼、霍普特曼等的艺术作品相媲美。我国古代的刘勰、司空图、叶燮等的文艺理论著作,不仅指导过我国当时及之后的创作,而且也曾给它们影响所及的国家以启发。而当今,虽然众口一词地要加强文艺理论和评论,却拿不出哪怕一部有国际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推出哪怕一位有世界号召力的文艺理论评论家!可以说,当今我国的文艺理论批评比文艺创作更为落后,也就更亟待振兴,将其纳入原创性著作之中,给予支持、激励、扶持,或许不久的将来,也能诞生出我国自己的别、车、杜吧!

当原创性的作品和著作大批涌现之时,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新高潮的局面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宣告形成了。

洞察

增强当代文学批评力量

□杜雪琴

路究竟在哪里?

近日,由湖北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评论》编辑部等联合举办的“批评的力量: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策略”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会议讨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现综述如下:

铁凝曾经说过:“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对于文学批评家而言,也应当与作家相向而行,发挥文学批评应有的功用与效能。然而,与会学者对于当今的文学批评却存在共同焦虑,那就是文学批评的严重“失效”现象,许多批评家基本处于无能无力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无语”。中国传统文学经验无法解释当下中国文坛上种种文学现象,也无法解决面临的种种自我疑问与文学发展问题。邹建军(华中师大)认为,

“‘西风’总是绝对性地压倒‘东风’,这就是最近20年以来学界一再讨论的,中国文学话语的‘失语症’问题”,“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缺失与文学批评方法的没有原创性,是我们中国的中外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二是“无力”。文学批评对于当下中国的文学秩序与文学思潮,往往缺乏澄清和厘定的力量。江岳(湖北省作协)认为,“大力发展文化的时代,急需批评发挥力量,但由于种种原因,批评出现乏力和无效困境”。三是“无视”。在许多文学批评中,批评者缺乏独立的精神立场和审美尺度,无论无据、胡说八道。胡德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认为“主体精神丧失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平庸化的根源”,李遇春(华中师大)也认为“我们很多批评的写作已经丧失了我们的主体性,文学创作成为了一种消费,我们的文学批评也沦为了另一种消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存在“三无”现象,说明它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功用,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不相适应,有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困境。

面对文学批评的困境,我们的出

首先,注重文学批评的“质”。文学批评的“质”就在于文学批评的针对性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以作家所提供的文本为出发点,超越固有的批评体系和禁锢,坚守一种精神的高度与学术品格。任蒙(武汉作协)《文学批评要以对作品的鉴赏为基础》,罗漫(中南民族大学)《对于文学,文学理论是什么》、周新民(湖北大学)《走向审美:文学批评澄明之路》、吴艳(江汉大学)《文学批评:互联网中的热闹与沉寂》、杜雪琴(华中师大)《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之效用——以易卜生〈海上夫人〉重读为例》等发言,都认为文学批评主要是指向文学文本,如果失去对文学文本的审美阅读与审美发现,文学批评就会没有对象地东拉西扯,从而强调了文本细读的重要性。正如罗漫所说:“阅读文学作品本身,获取文学愉悦和美感体验最重要。理论时时创新,也可以时时老去,只有文学阅读永远年轻。”

其次,注重文学批评的“实”。文学批评的“实”在于批评实践的求真与务实,讲真话,说实话是文学批评的本质要求。邹建军认为,“文学批评方法原创性的基点,就在于特定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少一点空头理论的建构,我们是不是可以少一点对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用,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地消化西方现有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以自己的创造为主进行中外文学的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文学批评的效用就在于广泛参与文学活动,适时地